

历史

苏联30年代的“大批判”与联共（布） 政党文化的形成

马龙闪

【内容提要】政党文化是一个政党在其社会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理论观念、思想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一系列关乎其政略方针、制度设计、文化方针政策以及党员队伍素质等各个精神观念层面的东西。联共（布）政党文化的形成，同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以及为此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直接相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联共（布）思想文化的大转变及此后发生的大批判，使联共（布）政党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政治上，确立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哲学上，大搞形而上学，把斗争绝对化，奉行“斗争哲学”；在文化上，抛弃列宁—布哈林的思想文化路线，禁绝流派竞争，建立“大一统”组织和单一创作方法，进行专横的行政干涉，挥舞棍棒，乱贴阶级和政治标签，复活“拉普”幽灵，执行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这样形成的政党文化，远播国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严重后果。

【关键词】“大转变” 30年代大批判 联共（布）政党文化 “拉普”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1-0068-0011

世界上自近代出现政党政治以来，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政党文化。一个政党在建党过程、政治实践和党派斗争中所形成的文化，是由其所处国家地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该政党用以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理论斗争的实践所决定的。而其政党文化本身又涵括该政党队伍素质本身及其政略方针、制度设计、精神文化各个层面。所以，一

个政党的文化是一个涵盖面很广、容量甚大的课题。就联共（布）政党文化而言，也是如此，在一篇字数有限的文章中是难以容纳的，所以，我们在此仅仅把题目限定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思想文化批判对联共（布）政党文化形成的影响上。由于这一时期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对于联共（布）政党文化的形成极具典型意义和决定性影响，所以，我们主要选取这一阶段的批判和斗争来加以

【作者简介】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论述。这样,大体就可以把联共(布)政党文化的面貌及其主要特质呈现出来。而由于联共(布)是由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奠基并为其早期阶段,我们论述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概略地涉及该党初建及其早期阶段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一、联共(布)早期政党文化的奠基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沙俄专制农奴制国家,主要是在地下秘密斗争的环境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在深入研究、认真吸取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以俄国“土地与自由社”和“人民解放协会”等革命民粹主义组织“为楷模”^①,以全新面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其主要的建党理论著作《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至1902年2月)》一书中,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建成一个“绝对需要有集中化”的、具有“高度的秘密性”^②和“严肃组织原则”的、“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③。列宁曾用“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集中的战斗组织”^④、“坚强的革命组织”^⑤等等短语来界定、称谓这个组织。列宁要求这个组织的成员不必多,但务必精干、坚强,是经过考验和严格训练的“职业革命家”^⑥,他们要“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⑦,并“集中在数量尽量少”^⑧的人,比如“‘十来个’职业革命家”^⑨手里;但围绕着这个组织的,“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这样的外围组织应该尽可能的多,“必须遍布各地”^⑩。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过来!”^⑪

列宁建立的这样一个完全新型的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经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洗礼迅速发展壮大,由二月革命后一个只有2.3万人的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在“土地、自由、面包”这一口号的召唤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到十月革命时就发展到近10万人的规模^⑫,通过发动工兵武装起义,一举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企图采取剥夺资本家的资本、没收地主和寺院土地、实行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措施的军事共产主义等方式,“直接过渡”

到社会主义。由于余粮收集制严重伤害农民利益,引起以坦波夫为规模最大的各地农民起义和民众骚乱,特别是引发反映农民不满情绪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感到政治事态的极端严重性,因此迅速改变方略,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了以粮食税为中心、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从原先的由落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改变为通过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它是把工作重心由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组织“文化工作”的战略性的重大转移和重大改革。

1917年以后,列宁在党内主要针对“军事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进行了斗争。这些派别大多从“左”的方面如反对任用旧专家、拒绝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反对个人负责的一长制等问题上对党的路线提出挑战,有些则表现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在思想文化领域,除1922年曾进行反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斗争,向国外放逐约170位文化知识界著名教授、专家和学者外,主要进行了反对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从1920—1922年,列宁亲自领导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1923—1925年,俄共(布)继续列宁的路线,进行了同以“拉普”(“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以亚·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给“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中心口号是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只有无产阶级自己,即产业工人才能创造出来;为了在创造这种文化时保持其“纯洁性”,必须通过“净化的”、“特殊的人工实验室”,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种机构来从事创造。他们宣扬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血统论”,认为只有在工厂机器旁工作的产业工人,才能有最纯

① 《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129页。

② 同上,第119页。

③ 同上,第165页。

④ 同上,第130页。

⑤ 《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⑥ 《列宁全集》第六卷,第162页。

⑦ 同上,第119页。

⑧ 同上,第119页。

⑨ 同上,第119页。

⑩ 同上,第120页。

⑪ 同上,第121页。

⑫ 据有关资料,截至1918年1月1日,俄共(布)仅有11.5万人。

粹的“文化血统”，只有他们才能创造最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粗俗的、一眼就能看穿的庸俗社会学理论，但在当时却吸引着并迷惑了成千上万的左翼知识分子。列宁在1920年和1922年曾两度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最后改组了他们的组织，取消了他们对文化的领导权，并限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但紧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之后，极“左”文化思潮的另一变种——“拉普”产生了。它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带迷惑性的、以同样极端革命面貌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

“拉普”鼓吹把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式搬到和平时期，在文化艺术战线进行“阶级战争”，主张以直攻近取、军事命令的方式夺取文坛领导权；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庸俗化，宣扬文学即政治，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甚至要求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则。它实质上宣扬的是较“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多加工的、更为精致的庸俗社会学理论。1923—1925年的文学大辩论后，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制定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5年6月18日通过。这个《决议》重点批评了“拉普”加剧阶级斗争的极“左”文艺路线，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虽没有停止”，但“其形式则已改变”、逐渐趋向缓和，因此，应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①。《决议》纠正了“拉普”打击“同路人”作家和文化人的“左”的政策，指出应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和利用的政策。《决议》反对“拉普”以行政强制手段独占文坛的做法，提出党主张在这方面实行“各种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反对在文学事业上企图采取“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②。

最重要的是，《决议》在理论上指出了艺术阶级性的“无限多种多样”和极端复杂性，反对在文艺领域把阶级性简单化、绝对化和庸俗化，反对把文学等同于政治，反对让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这实质上是对苏俄和俄共（布）队伍中长期存在极“左”文化思潮的批判，是对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的庸俗社会学理论深刻而系统的清算。

这个文艺政策决议，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不仅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就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对包括列宁亲自

领导的苏联早期文化运动的总结，并且是由苏联“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亲手制定的，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文献中，至今还没有能出其右者，它对苏联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年代苏联整个学术文化领域的良好局面，同这一文献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以及阐发的文化艺术政策和理论密不可分。

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决议》产生未久，很快就发生了联共（布）路线和思想文化方针的“大转变”，使上述几乎所有思想文化成果都付之东流。这一转变的起点，是斯大林1928年发动的所谓反“右倾”运动，最后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发生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面“大转变”的背景下，斯大林于1929年2月28日发出《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肯定“拉普”“总路线基本正确”，指出“只有你们，唯独你们”，即“拉普”，“才配领导文艺战线”^③。这就等于在事实上把文化艺术的领导权正式委任给了“拉普”及其代表的极“左”路线。

俄共（布）早期政策及其为联共（布）党史文化奠定的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俄共（布）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高度集中的、具有严格纪律的、特别能战斗的、无比坚强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因此能迅速发展壮大，一举取得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没能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其“秘密性”和高度集中性没有发生变化，这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2. 列宁领导党夺取政权后，虽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试图实行“直接过渡”，但很快灵活地转向“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列宁的伟大贡献，但不久斯大林就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并封锁了列宁晚年的著作，限制人们对它们的了解。

3. 列宁看到，在俄国这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充满着“左派”幼稚病，所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文化界，都接连不断地进行了顽强的反对“左”

① 张秋华、彭克巽、雷光编选：《“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② 同上，第321页。

③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КП(б), ВЧК-ОГП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Под ред. Акад. А.Н.Яковлева, сост. А.Артизов О.Наумов. М., МФД 2002. С.110-111.

的倾向的斗争。列宁的斗争是有成效的,这体现为党的路线顺利转入“新经济政策”轨道,很快取得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政治形势的稳定;由于批判极“左”文化思潮,还取得了20年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初步繁荣。

4. 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制定的1925年文艺政策决议,从理论上批判了庸俗社会学,校正了文艺路线和政策,集中体现并发展了列宁的文化理论及其成果。

5. 斯大林发动反“右倾”斗争,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又实行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以不同的形式和面貌,恢复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非常措施,重启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6. 斯大林肯定“拉普”“总路线”,是对列宁和布哈林20年代批判以“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的某种否定,是联共(布)思想文化路线的大逆转,自此,开始了联共(布)及其政党文化的新时期。

二、20世纪30年代思想文化批判

在斯大林同其反对派进行的所有斗争中,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堪称是最吃力、最困难的一场斗争。莫洛托夫作为紧跟斯大林30年、与之长久共事的同僚,最了解斯大林的心迹;他用“十分困难”一语来形容这场斗争^①。这可谓道出了斯大林的一个心结和隐秘。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布哈林是斯大林最强大、最难对付的理论对手;布哈林作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②,他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领悟最深,阐发最有力,是列宁逝世后捍卫新经济政策最得力、最顽强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1929年10月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斯大林一经从政治和组织斗争中腾出手来,就立即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着手发动一连串的大批判,从思想理论上扫除布哈林的影响。

(一) 意识形态“大转变”和经济理论领域的大批判

1929年11月7日,正值十月革命12周年纪念日,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亮出了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底牌,宣布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高速工业化,以集体农庄为导向的全盘集体化,在向“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政

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的“大转变”^③。

宣布“大转变”之后,12月21日,为庆祝斯大林50诞辰,全苏举行了盛大庆典活动,活动持续整整一周,歌颂“英明天才领袖”的声浪响彻苏联上空。自此开始了对斯大林无休无止的歌颂和个人崇拜。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演^④,发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转变”的动员令。这是他拿布哈林经济理论开刀祭旗,首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展的一场大批判。

斯大林以此为突破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布哈林首先是联共(布)党内最大的经济学家。无论列宁在世时还是在此之后,布哈林在理论上最为着力之处,还是阐述过渡时期的经济,通过经济理论为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做深刻论证。斯大林在政治上战胜布哈林之后,要清除布哈林的思想理论影响,首先从经济学领域开始是必然的。

斯大林在讲话中把布哈林及其一派的经济理论归纳为“平衡”论、“自流”论等等,进行肆意挞伐。他的讲话,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气势,往往一连用几个排比句、反诘句来批判布哈林,似乎逻辑严密,可以把论敌的理论驳得体无完肤,其实仔细研读,并没有讲出多少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道理。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平衡”论,难道各种成分的“不平衡”,就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吗?主张“平衡”又错在哪里了?

这个讲演的重要之处在于,宣布“集体农庄”是“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党“已经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⑤,在农村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全线进攻”。这实际上是对集体化的全面动员。

这个讲演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当时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需要,要求“理论工作必须赶上去”;必须对流行着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特别是布哈林在经济问题上的理论给予“应有的反击”。他说,“新的实践产生对

① [苏]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菲·丘耶夫日记摘编),刘存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21页。

④ 同上,第126页。

⑤ 同上,第143—147页。

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提法”^①。这实际上是号召思想理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反“右倾”斗争和取消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全面转折。

（二）哲学批判

正当对经济学理论批判方兴未艾之际，在斯大林讲话的号令下，哲学界又拉开了“哲学辩论”的序幕。

很快，在1930年初，两个“小人物”，一个是刚刚在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留校的马·米丁，另一个是还在那里当学员的弗·尤金，响应斯大林的号召，首先向《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著名哲学家德波林及其学派发起攻击，指责“哲学界领导”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哲学的党性原则，应当对哲学战线理论“落后实际的状况”承担责任。

德波林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围绕德波林形成的一个哲学派别。该学派立足于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任务，推动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研究。但带有若干经院气息，忽略了一些现实问题。不过，他们在哲学发展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成绩是不容抹杀的。

米丁和尤金等人最初也承认德波林“路线基本正确”，但仍对他们有诸多责难。德波林学派对论敌的批判进行了有组织的反击。双方论争一浪高过一浪。米丁、尤金等人当时仅是“哲学新兵”，论战中表现出的学术造诣和理论水平难以同德波林学派相匹敌，但他们以斯大林的讲话为论据，直指哲学战线理论状况“落后”，没有同党的步调保持一致，脱离现实政治，即没有联系反对布哈林的斗争，等等。他们特别指责德波林学派强调哲学的“特殊性”而忽略现实政治，指责该学派不了解当前哲学战线“转变”的“全部实质”在于，应“把哲学问题‘政治化’和‘现实化’”^②。由此出发，米丁等人对德波林学派提出许多政治责难。

“小人物”的“基本观点”得到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支持^③。这无疑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出的信号，“小人物”一下子受到莫大鼓舞。到1930年夏，他们开始把哲学争论变成政治批判，不仅揪住德波林学派对托洛茨基和“右倾”的态度问题不放，

还指责德波林及其学派贬低列宁，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主义阶段。这就开始将学术问题转变为重大政治问题。

如果说在“哲学辩论”前期还带有20世纪20年代民主辩论的某些“遗风”，允许答辩，属于一来一往的学术辩论的话，那么到夏秋之交，形势便急转直下，开始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打压和斗争。10月14日，具体领导这场批判的经过改组后的联共（布）红色教授学院支委会，虽在通过的决议中承认，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路线“基本正确”，但仍对它罗织了一系列矛盾百出、令人费解的政治罪名，诸如其错误具有“反党性质”，“政治上”有“机会主义表现”等等。

10月17—20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就“哲学辩论”举行的会议上，论辩双方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当该院副院长B.米柳京发表讲话时，德波林对其蛮横做法强烈不满，插话打断报告，两人一来一往，唇枪舌剑，出现戏剧性场面。正当冲突处于难解难分之际，由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党史学家、官方理论权威雅罗斯拉夫斯基出面，当场公布了德波林早在1908年写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又由其“流放难友”H.斯克普尼克出头揭发德波林在20多年前流放时的政治“老底”。这种显而易见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一举挫败了德波林的理论锐气，逼他立时放下武器，承认了“政治错误”。

很显然，“小人物”响应斯大林号召而开启的这场哲学批判，代表了当时联共（布）中央的立场和观点。在这场批判中形成的米丁学派实际上是一个官方哲学派别。在该派取得对德波林学派的决定性胜利以后，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以该派为核心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就“哲学战线的状况”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个谈话的详细内容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秘而不宣，只是通过米丁的讲话和此后联共（布）中央有关决议透露出了主要精神。60年以后，苏联学术界才从米丁死后送藏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务档案馆的笔记中得知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谈话得以公之于世。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127页。

② 张念峰、郭燕顺编：《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206页。

③ 同上，第206页。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他继1929年12月27日讲话、发出意识形态“大转变”动员令、发动哲学批判之后,亲临前线的一次再发动、再动员。所以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各领域的问题讲得更具体、更透彻、更尖锐、更集中,打击和进攻的目标也更明确,其主要意图也表述得更清楚。

概括起来,斯大林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第一,进一步指示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理论阵地展开“全线进攻”,并且强调,为此可使用“各种武器”。斯大林告诉米丁等人:“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展开攻击是主要问题。向各个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①斯大林对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理论方面的劣势地位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说,对方“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切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应当善于理解这一点”。他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状况也表示极大怀疑,号召“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捣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可以把史登、卡列夫打掉……为了进行战斗,必须使用各种武器”^②。

第二,号召不仅要清除德波林学派,还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批判迄今有碍于斯大林理论地位的一切最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包括梁赞诺夫、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甚至恩格斯。斯大林指出:“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还有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巴札罗夫等等。现在应当把他们的全部著作都翻腾出来。”接着又说:“就是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果这项工作在某地方涉及到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③

对于自己的政治对手和理论劲敌的布哈林,斯大林更不肯放过,因此要求“把布哈林的著作彻底翻腾一遍”,对其进行“严厉的批判”。最后,斯大林还特别提醒“别忘记梁赞诺夫。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这里同我们离得相当远”^④。

斯大林这些指示实际上是要对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理论界进行大清查,扫除不利于树立斯大林理论权威的一切障碍。苏联学者认为,这是要“为他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普山扫清道路”,把斯大林奉为“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和最高理论权威^⑤。

德波林后来在“解冻”年代给赫鲁晓夫的信证实了这种说法^⑥。

第三,明确提出要把学术问题看成政治问题。

“谈话”说,在任何抽象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政治意义”^⑦。所以,由此推定德波林学派是“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他们的错误具有“反党性质”。

以斯大林这次谈话为转折点,开始对德波林学派进行毁灭性打击,即“审查他们的全部著作,批判他们所写、所做、所说的一切”,并进行组织处理。

斯大林谈话第三天,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再次通过决议,完全抹去了过去对德波林的肯定性评价,转入对德波林学派的政治大批判。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中央正式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斯大林的谈话,做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解散杂志原编辑部,撤去德波林主编职务,批准成立以米丁、尤金为主要成员的新编委会。后来又给德波林学派一些成员扣上“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帽子,在“大清洗”中甚至将卡列夫(在哲学界的地位仅次于德波林)指控为“死硬的反革命恐怖分子”、“谋杀基洛夫的直接组织者之一”^⑧,把他同德波林学派的其他成员史登、卢波尔等一起判处监禁,而后予以枪决。

这场批判,在哲学上对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由于哲学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占据特殊地位,这场哲学批判又是在斯大林亲自发动、具体指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为以后的大批判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批判模式,发挥了样板示范作用。主要体现在:否定对立面的统一,把矛盾斗争绝对化;将一切抽象的理论问题都视为政治问题,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形成了以米丁、尤金为首的苏联官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派,由它干预一

① 《米丁笔记》,藏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4库,第24卷。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苏]尼·马斯洛夫:《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形成过程及其实质》,参见马尔科维奇和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页。

⑥ [苏]格·伏尔科夫:《复活·斯大林是怎样成为伟大哲学家的》,载[苏]《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6月7日。

⑦ 同上。

⑧ 张念峰、郭燕顺编:《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第186—187页。

切学术理论争论。

正是根据斯大林谈话中要对过去党内理论家“全部著作”“彻底翻腾一遍”的指示，1930—1931年，联共（布）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书报检查的制度，对上述理论家和反对派的著作一一进行清查，把它们统统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与此同时又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和文献，凡要公开发表的，必须报总书记批准^①。这样，也就屏蔽了列宁晚年的有关文章和书信，把有关马、恩、列著作和文献的发表权、解释权，全部操控于斯大林一人之手。

（三）文艺批判

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拉普”多数派领导，原本接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文艺政策决议的批评，开始认识原先的某些“左”的错误，有了一定进步，但斯大林写给“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肯定其路线之后，“拉普”一下子翘起了尾巴，并且借布哈林倒台之机去翻1925年《决议》的案，他们甚至掀起一片鼓噪，要求撤销这个重要决议。在这种由反“右倾”引起极“左”思潮反弹的形势下，“拉普”原来“左”的病症复发：对作家重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故伎；继续搞宗派主义，打击一大片；在文坛发号施令，对创作大搞行政干预；宣扬庸俗社会学，以政治代替文艺；等等。

斯大林计划以“拉普”为基础，组建全苏作家协会和有关文艺团体，让“拉普”全权领导文艺界，但消息一经传出，苏联文艺界立时炸开了锅，作家和文化人士纷纷投书党中央，投书斯大林，表示强烈反对。面对这种局面，斯大林进退维谷，此时恰好发现原先曾任莫斯科共青团书记的“拉普”头头阿维尔巴赫，同原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沙茨基有牵连，后者被揭发倾向布哈林，有“右倾投降主义”之嫌。这样，斯大林就转而失去了对阿维尔巴赫的信任，指示《真理报》发起对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拉普”的批判。于是，一股风起，猛批“拉普”的所谓“右倾”。原本“拉普”“左”病复发，现又批其“右”，这更把“拉普”推向极“左”的方向。1931年就是在对“拉普”的这种批判中度过的。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拉普”，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大一统”的苏联作家协会，在各艺术领域也分别成立大一统的团体^②。

至此，苏联结束了20年代各文艺团体和流派“自由竞赛”的局面，在组织上都统一到全苏范围的中央协会中来；原先各种各样的文艺主张和纲领都遭到批判，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各派原来出版的文艺刊物，也按中央决议精神相继停刊，改由国家官办刊物一统天下。苏联的文学艺术走上了30年代单一的规范化道路。

“拉普”，在组织上被解散了，但“拉普”的文艺路线（即所谓“总路线”）和“拉普”多数领导及其骨干力量，都一一保留了下来，并被提拔重用。斯大林和联共（布）在文化艺术领域实质上推行的仍是“拉普”路线，更确切地说，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只不过修正了其某些表面上的错误，而1925年中央政治局《决议》所指出的主要错误则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四）从史学批判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

历史对全党和广大群众的教化作用，对确立当政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斯大林是深悟其中真谛的，因此，他对史学尤其是现代史和党史及其研究动向一向十分关注。清除党内反对派以后，斯大林要确立自己在党内和国家的绝对权威，是不能允许20世纪20年代那种对领袖人物可以议论评说的宽松状态继续存在下去的。为此，他首先要制止学界对列宁的学术讨论。

1930年12月，《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刊登了一位普通史学工作者斯卢茨基^③的《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作者对列宁对待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中派的态度问题有所评论。按照20年代以来学术讨论的常态，这是极为正常的。但正是这篇文章，为斯大林直接发难、干预党史研究和学术争论提供了借口。

1931年初，斯大林以《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写信给《无产阶级革命》

^① 笔者于1987年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亲眼看到一件档案，是当时任该院院长的弗·维·阿多拉茨基给斯大林的一个专门报告，申请公开发表恩格斯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在该报告上有斯大林批示同意的亲笔签字。这使我们联系到为什么列宁晚年的有关文章和书信，在斯大林时期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中全文发表。

^② 曹葆华等：《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③ 系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帝国主义研究室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研究组学术秘书、副教授。

杂志编辑部,对该刊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坚决抗议”^①,指责作者是在“反党”,是“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还给一系列史学家扣上“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和“伪造者”之类的政治帽子,并指斥该杂志刊登此文,是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问题”、“布尔什维主义的公理问题”拿来讨论,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②。

问题一经这样严厉地提出,史学界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斯卢茨基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处分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和机构,甚至连他兼课单位的教研室主任也被列入解职之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除改组编辑部外,还停刊整顿一年;所有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历史著作都遭到审查,一切史学机构都按《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精神进行清查,实际上扩大成了对史学机构和所有史学家的一次全面大审查。其间,被点名批判的人不计其数。莫斯科以外地方的批判运动更是变本加厉。1932年初有一份报告说,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③。

斯大林之所以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史学批判,显然是有多层深远用意的。一是禁绝对领袖人物的一切议论,违者严惩不贷。二是把矛头指向一系列“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特别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史学家。我们知道,革命后苏俄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党史学家,他们多是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参加革命,作为亲历者,对党的历史了如指掌,这些人有A.C.布勃诺夫、Д.Б.梁赞诺夫、B.涅夫斯基、A.Г.施略普尼柯夫等。他们作为老资格的党内干部,对斯大林的革命根底和经历十分了解,他们也都有党史或革命史著作问世,不可能参与改写历史,无原则地歌颂斯大林。斯大林对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即使被斯大林视为“自己人”的,如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紧跟斯大林的史学家,因其著作对斯大林没有歌颂到位,也是不能被放过的,必须悔悟,必须认识著作中的“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④。三是为下一步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为改写历史、改写党史做准备。

但重编历史教科书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从1934年5月16日发布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编订历史教科书的决定之后,几经延宕,进度缓慢。为把重编历史教科书纳入确立斯大林历

史地位和个人崇拜的政治轨道,还必须清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及其史学体系这一障碍,这样,由审订历史教科书,很快又发展成了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一场批判运动。

决策者表面上的要求是,“教科书和教学本身”应克服过去的“抽象化和公式化”,而底里却是要求写英雄和领袖人物,写斯大林,并要求大大加强苏联史的现代部分,不是“把历史中断在1923年”,即列宁时期,而是“将历史写到1934年末”^⑤,即大写特写斯大林执政时期,歌颂斯大林。

实际上,编订党史教程的过程,也是一个整肃、批判的过程。一开始许多史学家没能领悟决策者的这一意图,编写的教科书难以到位,经多次审查均不合格而被退回。他们一遍一遍地改写,也总是一遍一遍地遭到申斥。最后,大批史学家被扣上“史学界的暗害集团”、“托洛茨基的思想掩护”等政治帽子和刑事罪名,把其中不少人作为“人民敌人”,给予逮捕、监禁、流放,甚至判处死刑。经过这一系列残酷的思想批判、政治斗争,甚至刑事处分,方才有少数人领悟到个人崇拜的真谛,把史学纳入到斯大林所要求的思想政治轨道。而这时,斯大林体制模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已基本形成;这样,从30年代中期以后联共(布)党史教程开始编订,由领悟个人崇拜真谛的少数几个人执笔撰稿,他们在斯大林提出分期纲要和哲学部分章节的基础上撰写成篇,最后又由斯大林捉笔定稿而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1938年上半年成书问世,书中对列宁创建党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篡改和歪曲,主要表现在:1.按斯大林分期法,认为1912年第六次党的布拉格代表大会为布尔什维克建党之始,这样就降低了列宁1903年建党的功绩。仅仅因为斯大林在此次党代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制造了斯大林在建党之始就领导党的神话^⑥。2.按照斯大林的分期法,新经济政策阶段及其概念被完全排除在党史之外,这就基本否定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② 同上,第76—77页。

③ 载《阶级斗争》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第12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89—91页。

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5页。

⑥ 马尔科维奇和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9—871页。

了列宁的这一创造性政策。3. 按斯大林的分期，制造了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用伪造的史实把斯大林提到了同列宁并列的地位。4. 把一部丰富生动的党史变成了一部干瘪枯燥的党内斗争史。在其编撰者看来，斯大林是除列宁之外提供正确路线、方针和理论的唯一“源泉”。5. 编撰者以种种手法歪曲历史，或借助斯大林的言论为历史事件定性，或者通过突出斯大林著作的方法夸大其历史功绩，甚而通过伪造史实，编造斯大林同列宁的“伟大友谊”^①，以抬高其个人的历史地位。这部党史开启了以官方建制的形式，经党的最高机构审查核准，在充满教诲箴言的郑重党史中伪造史实，公然编造假话的风气。

三、结论

马克思说，武器的批判替代不了批判的武器。这说明马克思历来是重视思想批判的，但马克思的批判，是指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指向蒲鲁东、巴枯宁等人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等等。列宁继承了这一重视思想批判的传统，但其指向也同样如此，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和反动的理论和思潮。

然而，斯大林手里所紧握的批判武器，却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看看斯大林从反对布哈林的“右倾”，取消“新经济政策”起，即从“大转变”开始所进行的一系列批判，几乎无不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向了与列宁相反的方向。

布哈林坚定地捍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逐渐走向缓和，工作中心应是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他严格遵循列宁的合作制思想，主张处理好工农联盟，按照循序渐进、平衡法则发展国民经济，推进合作制；他按照列宁的文化思想，和卢那察尔斯基一起，共同制定了1925年俄共（布）中央文艺政策决议这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沿着列宁的道路，团结同路人作家，继续批判“左”的文化思潮。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由此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斯大林以反“右倾”斗争为起点，沿着与列宁相反的方向，在经济学、哲学、史学和文艺等领域进行的几乎所有批判，都导致了“左”的错误，造

成了极大的、长远的消极后果。这样，经由这些批判积淀而最后形成的联共（布）政党文化，就由这些大批判的后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集中体现出来。对此，可以集中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在经济上，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超阶段”的“直接过渡”；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强制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在政治上，实行形式上的人民民主、实质上的个人崇拜、领袖个人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泛化并扩大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实行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和镇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变成了主要是针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无法制的镇压。

在文化上，提出“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②，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消灭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就必须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文化。同时，以大批判、大斗争和大整肃的手段，肃清包括中间思想形态在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封闭环境中培育无产阶级意识；以垄断的方法，通过哲学粗暴干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就在学术文化上导向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造成思想理论上的僵化、凝固和教条主义，带来了学术文化和艺术的萎靡不振。

以肯定“拉普”“总路线基本正确”为标志，斯大林实际上抛弃了1925年通过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文学政策决议，修改了20年代列宁—布哈林的文艺路线，由重视清算极“左”文化思潮的方针，转变为不断对所谓“右”的倾向的批判。

“拉普”路线原本为“左”，斯大林不仅对其加以肯定，后来又批判其“右倾”，这样就把它推到了更“左”的道路；而且，他把“拉普”的“总路线”加以吸纳，变成自己的文艺路线，又进而推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甚至推向整个政治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十分广泛而又严重的后果。

通过袒护“拉普”的政策和在文艺界的批判，

^① 马尔科维奇和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第874—875页。

^② [苏]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8页。

篡改了俄共(布)政党文化原来的内涵: 1. 不是实行对文化艺术“有分寸感”的“总的领导”, 而是进行事无巨细的“管束”和“行政干涉”。2. 放弃了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文艺阶级性复杂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转向“拉普”的庸俗社会学观点, 把文艺的阶级性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教条化, 主张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3. 不是按照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逐渐缓和的规律, 采取正确的阶级路线, 对同路人作家实行争取团结的政策, 而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 对作家和文化人施行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4. 放弃提倡各文艺团体和流派“自由竞赛”的政策, 解散所有文艺团体和流派, 建立“大一统”文艺组织, 将创作方法统一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来。5. 不是遵照列宁主张的对文化艺术事业不做“过多的管束”, 实行民主地、内行地、协商地、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感召力有说服力地领导文化艺术, 而是对文化艺术事业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

通过一系列批判, 特别是通过哲学批判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出版, 在理论思想上形成的突出特征是:

第一, 确立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以其理论是非为是非, 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以他所解释的马列言论为唯一标准的马列主义。这样一来, 他不予公开发表的列宁晚年著作^①, 他所屏蔽或提出异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也就被完全排除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外。

第二, 否定商品经济, 否定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从落后的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 奉行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 这是联共(布)最基本的理论特点之一。

第三, 奉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持续不断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 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 这是联共(布)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四, 在哲学上, 违背唯物辩证法, 走向形而上学: 一方面, 否定矛盾的普遍性, 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 宣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②; 另一方面, 却把对立面的统一“斥之为形而上学”^③, 只承认矛盾的斗争性, 否定矛盾的统一性, 这便导致将斗争绝对化, 在实践上引发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在和平建设时期人为地煽起阶级斗争, 搞“大清洗”, 引爆社会、分裂社会。

第五, 把一切抽象的理论争论都视为政治斗争, 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艺术观点与政治问题的界限。

第六, 形成了一套大批判的模式: 从发起学术论争着手, 直接上升为政治批判、政治斗争, 接着进行行政处理, 改组刊物和机构, 最后对学者逮捕、判刑。

第七, 在批判中形成了以米丁、尤金为首的苏联官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派, 即斯大林学派。其特点是: 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 把一切问题政治化。简单化和政治化是其思想理论的最大特色; 借哲学的特殊地位, 用哲学干预一切, 代替对各学科的具体研究, 为伪科学学派在苏联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挥舞棍棒, 乱贴阶级和政治标签, 在思想理论界全面复活了20世纪20年代“拉普”的幽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 联共(布)中央通过专门决议,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学习运动, 召开各级宣传干部和宣传员大会, 开办各类学习班, 向广大党员和群众灌输教程的思想。这就使教程凝固的教条主义、“左倾”激进主义和空想主义深深地刻入全党和广大群众意识, 从而使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以体系化、模式化的形态, 得到了十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官方评定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 实际上成了推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成了斯大林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和斯大林体制模式的集大成者, 这样, 它就使联共(布)的政党文化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 最终不仅在苏联国内各条战线、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文化艺术各部门, 甚至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以完备的形态呈现出来, 而且很快远播国外, 深深影响到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后果。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从337—392页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未收入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文集》, 这些文章只是在1956年根据苏共中央决定才公开发表, 后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36卷。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第160页。

③ 林利:《往事琐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128页; 参见尤金:《简明哲学辞典》有关对立统一规律词条。

Mass Criticism and Repudiation of the Thirties and Forming the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MA Longshan

Abstract: The political party culture is theoretical concepts, norms of thinking, way of thinking, code of conduct,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political tactics, system design, cultural policy, Party member's quality, etc. Forming the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s related to the "great change" of Stalin giving up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a series of mass criticism and repudiation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s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great change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hence the mass criticism and repudiation brought about a profound change to the Party culture: in politics, they established a personality cult of Stalin and a theory of "intensified class struggle"; in philosophy, they practiced metaphysics, made class struggle absolute and pursued struggle philosophy; in culture, they cast off Lenin and Bukharin'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line, totally banned sect competition, set up a "colossally unified" organization and a unitary creation method, carried on a tyrannical interference in administration, pinned political labels on others indiscriminately, made "Lapo" spirit revived and implemented Lapo line without Lapo. Such a political party culture spread abroad and brought about serious consequenc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Key words: "great change"; mass repudiation of the thirties; political party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apo"

“Массовая критика” в СССР в 30-е год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партий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КП (б)

Ма Лунша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Культу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 эт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ритерии, способы мышления и нормы поведения, касающиес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работки системы,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е партией в е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е, а также командные качества членов партии и другие понятия во всех аспектах мораль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партий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КП(б)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с отказом Сталина о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курса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ЭП) и с массовой критикой в идеологии и культуре. Изменени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установок ВКП(б) в 20-30-е годы XX столетия и возникшая вслед за этим массовая критика, вызвали глубокие перемены в партий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КП(б):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был взят курс на “усиление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возникло господство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 в философии борьба была возведена в ранг абсолюта,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реализац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борьбы”; в сфере культуры – отказ от идеологии Ленина и Бухарина, создается единый творческий метод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и художников,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деспотизм, навешивание лживых классов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ярлыков,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РАПП”. Эта сформировавшаяся культура партии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ась за пределы страны и оказала серьез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ольшой поворот”; массовая критика в 30-е годы; партий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ВКП (б); “РАПП”